

校雠言通義通解

〔清〕章學誠 著
王重民 通解





校讎通義通解

〔清〕章學誠 著

王重民 通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校讎通義通解

〔清〕章學誠 著

王重民 通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2 印張 7.25 字數 178,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500

統一書號: 17186·103 定價: 2.95元

序 言

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是我國古典目錄學專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對於我國近百年來的目錄學方法、理論一直發生着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目錄學遺產，對於閱讀和研究《校讎通義》，已經成了相當普遍的要求。我為這部目錄學古典專著作通解的目的，就是想為圖書目錄工作者和學習古典目錄學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讀本，極力用現在的語言，解說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所討論的目錄學方法、理論。

《校讎通義》原稿共四卷，後來遺失了第四卷，就成為現存的《內篇》三卷。《章氏遺書》刻本除了《內篇》三卷外，還有《外篇》一卷。《外篇》包括論文二十一篇，大概是王宗炎校定《遺書》時所編輯的。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依《章氏遺書》本標點印行，我現在作“通解”也是根據這個本子，但刪去了《外篇》。

《校讎通義》的《內篇》三卷，凡十八章，一百二十八條，我是逐章逐條作解釋的。“通解”的內容，對於一般的文字、人名、書名不作解釋；但對於比較生疏的文字和典故，對於需要解釋，或有問題、有錯誤的人名、書名，都作了必要的校勘和注解。“通解”中最着重的是章學誠在每章每條內所闡述的目錄學方法、理論。他的目錄學方法、理論有許多地方是和我們今天相近或相通，有歷史繼承關係的，但由於他所用的是古代語言，他所舉的是古書例證，對現在的讀者有些地方不加解釋就不容易看清楚。我的“通解”

就是要着重的說明這些地方，期望正確的反映出章學誠的見解，間亦指出他立說的得失和是非。

《外篇》所載的二十一篇論文與《內篇》的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另代以附錄一卷。附錄分兩個部份：附錄一是《章學誠目錄論文選》，只選了他有關目錄學方法論文五篇；附錄二是《章學誠大事年表》。《年表》專輯有關章學誠學術研究和目錄工作活動的資料，與五篇論文合讀，也許符合王宗炎編輯《外篇》的意圖，但對讀者來說，比《外篇》更有用。

所以這個“通解”本仍然是四卷，計：《內篇》三卷，《附錄》一卷。

在“通解”中，多是隨文釋義，不能對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作系統的評述，所以在這裡概括地闡述一下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

× × × ×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在青年時期便涉閱了《二十一史》和其他文史書籍。他自稱：“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①這說明他對於文史書籍的愛好，也表現着他的才能所在。一七七三年，他開始編寫《文史通義》；同年，在他纂修的《和州志》內編寫了一篇《藝文書》，按照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圖，分為八大類、三十五部（類目），分別著錄州人著作。又仿《七略》撰寫《序例》和《輯略》，表達了他在這時期內初步形成的目錄學系統思想。後來，他把這篇論文的前一部份改題為《和州志藝文書序例》，章華綬把它刻入《文史通義外篇》。（王宗炎編輯的《校讎通義外篇》也收了這篇《序例》，校刻時因與《文史通義外編》重複而被抽掉了）。

一七七九年，章學誠寫出了他的目錄學專著——《校讎通義》的初稿。是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的基礎上，仿鄭樵《通志·校讎

略》分章分節，用標題立論的形式編寫的。初稿本來是代替三通館給《續通志》所擬的稿子，原題爲《續通志校讎略》。在初稿裏，章學誠當然盡可能寫出了他的目錄學思想；但既然是給官書擬稿，就不能不有所保留，因而他自己在當時就不很滿意。到一七八八年他編寫《史籍考》的時候，又作了徹底的修改。我們今天看到的《校讎通義》就是這次修改成的定稿。可以說，章學誠的目錄學系統思想，到這時候才完全成熟。

一個成熟的、有貢獻的目錄學家必須接觸豐富的圖書資料，有長時期的目錄實踐，才能批判地繼承古代目錄學家的經驗、方法和理論，從而創造新的方法理論，並檢驗與修正自己的方法理論，使它更系統、更完整、更能促進今後的目錄工作。章學誠生在封建社會末期，有着很大的時代局限性。但他閱讀了極其豐富的圖書資料，在編纂地方志的過程中，在編寫和討論《文史通義》的過程中，在編寫各種目錄的實踐中，他正確地認識了圖書資料與學術研究的關係以及目錄與圖書資料的關係；同時對編制參考目錄、專科目錄也有了新的方法理論，使他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茲對他的目錄學系統思想，分爲三個方面，闡述如下：

1. 圖書資料、學術研究與目錄的關係 目錄的對象是圖書，目錄的任務是揭示圖書資料的內容，給學術思想研究提供正確的材料。一個目錄工作者能否編出有用的目錄，一個目錄學家能否提出新的目錄學方法理論，主要基於他能否認識圖書資料、學術研究與目錄的正確關係。章學誠在這些方面的認識有不小的局限性，也有一些錯誤，但總的說來，他是在和當時的考據學、理學的鬥爭中，逐漸認識了它們的關係，而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學說，過去有不少的經學家、史學家都做過一些解釋，但沒有人從他的目錄學思想方面着想過。

我以為章學誠在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之下，又緊接着解釋說：“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②有些地方又說“六經皆掌故”，“六經皆器”。“政典”、“掌故”、“器”都是史，也都是圖書資料。圖書資料是記載人類社會生活和活動的工具，人們通過對於它們的閱讀和研究便能得到學問，或者說得到“道”。章學誠認為學問與圖書資料的關係，就如“道”與“器”的關係。他說：“《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③又說：“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④這樣，他就打破了封建經典的偶像，也提高了圖書資料的價值，而給予圖書資料在學術思想研究中以正確的地位。

章學誠把整理和保存圖書資料的工作看成是作學術思想研究和著作的“三月聚糧”^⑤，有時他又比作“蕭何轉餉”^⑥，認為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準備工作。為了喚起理學家和考據家的注意，他說，研究、著作與圖書資料的關係，“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⑦。這樣用“糟粕”、“糞土”作比方，的確更能顯示出圖書資料的重要意義，但容易使人誤解，所以他又進一步作解釋，說那並不是“貶辭”，而是有很深的意義。因為“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⑧。章學誠提出的整理方法是“欲其愚”，“愚”就是保存它的本來面目。他認為，若能給研究著作家提供最忠實最正確的材料，他們就能“化臭腐而出神奇”^⑨！

章學誠對圖書資料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對於考據學和理學的利弊，也就洞若觀火，能提出比較公正而又確當的批評。他認為考據學與理學之爭，都是由於片面的了解了“道”與“器”的關係。性命是不可空言的，理學之失在於“離器言道”；考據學之失則在於“溺於器而不知道”。考據學家說：“天下之道在於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實在是片面的見解；正確的方法是“即器以明道”，也就是他常常說的“道器合一，方可言學”^⑩。考據學家“溺

於器而不知道”，理學家對他們“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但矯枉過正，從而提出“玩物喪志”，“工文則害道”種種說法，直然欲“使人舍器而言道”，正如“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⑩，那就錯了！

章學誠對於考據學的功用，雖沒有專篇論文闡述，就他對於圖書資料的處理態度來說，好像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在《與吳胥石簡》的一條小注中說：“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⑪好像說研究學問是從豐富的圖書資料中抽出規律（他叫“義例”），所以有學問家；考據學祇是分析和鑒定圖書資料的方法，是應該附屬於圖書資料學之內的，所以沒有考據學家。

章學誠爲了給學術研究提供正確的、系統的材料，把目錄學的任務規定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有根據、有目的的。這種提法就是使圖書資料的著錄、分類、解說，都必須與學術史、科技史聯繫起來而成爲它們的助手。單是把目錄學的任務這樣明確起來，已經是章學誠在目錄學上的一大貢獻了。

2. 目錄學的系統思想 這裏所謂系統思想，是指章學誠依我國圖書資料的歷史發展，用社會進化和學術思想發展的觀點，系統地闡述了我國目錄學史中編制目錄的方法、理論和觀點。

章學誠在《校讎通義》第一章，首先揭出了《原道》的重要意義（他在《校讎通義》初稿的標題是《著錄先明大道論》）。爲了進一步發揮這一思想，後來在《文史通義》內又寫了《原道》三篇。章學誠明白指出，凡治目錄學和文史學的人必須“先明大道”。大道是甚麼呢？章學誠在《原道》上篇中說：“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又說，“未有人而道已具”，“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這就是說，道是自然規律，是先人存在的。人在道的面前，祇有聖人才能認識它，遵循它（“不得不然”）。他說：“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⑫治目

錄學的人要先明大道，就是要認識圖書目錄的當然和所以然，即發展規律。

《文史通義》的《原道》篇是從宇宙的起源和人類社會的起源說起的；《校讎通義》的《原道》則是從人類社會進化到了古代文明的時期，從有文字以後說起的。主要闡述了圖書目錄的起源和發展過程。章學誠認為我們的祖先自從進入了文明社會以後，國家的制度雖說逐漸建立起來，但直到戰國以前，還沒有私人著述。當時所有的圖書資料都是官吏統治人民所遺留下來的政典掌故，所以都由政府各部門的官吏掌管，也就由各該部門的官吏傳授其學。他說：“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④這樣的闡述大致是符合我國這一時期的圖書資料發展情況的。他的缺點是在想像中未免對古代社會有些誇大，也就必然不符合歷史實際。

對於當時圖書資料的掌管保藏，以至目錄的組織、作用，章學誠也作了系統的闡述。他說：“六經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又說：“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⑤在這樣的情況下，章學誠認為：“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分類）之法也。”這就是說，《周官》的三百六十官就是那時候的一個自然分類表。在我國圖書目錄發展的過程中，認為學術在官時期圖書由官師來保管是可以的，要由此追述學術的源流也是可以的，甚而認為初期分類表有些類目是在自然發展中形成也是對的，但把三百六十官做爲一個自然的分類表，就未免牽強了。因爲圖書分類表總是由圖書目錄學家依據圖書資料發展的具體情況編製出來的。

春秋以後，出現了私人著述，沖破學術在官，圖書官守的簡陋制度，目錄工作進一步發展起來，逐漸形成了系統目錄，產生了人爲的圖書分類表。這一工作是由劉向父子第一次完成的。章學誠對於他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⑥這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說《七略》的體系，是結合着我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並且溯源於《周官》，以部次當時所有的重要圖書資料。章學誠認爲這是我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所以竭力闡述它，表揚它，期望世世代代繼承下去。

章學誠指出《七略》的編纂方法，《輯略》“最爲明道之要”，凡是關於各類圖書的主要內容及其流派必須與學術思想相結合，凡在圖書的著錄或敍錄（提要）中所不能闡述的地方，都可在《輯略》中集中闡述。章學誠論《七略》的《輯略》說：“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這就是說在《輯略》裏，不但使目錄發揮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還起着與當時政治相結合的作用。《孟子·公孫丑》篇說，“何謂知言？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由此可知，章學誠的所謂“辨章”，所謂“考鏡”，所謂“知言”，都是要使目錄的內容，能够結合實際，結合當時的政治，評論學術思想的得失，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章學誠說：“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⑦

東漢、三國以後，由於圖書資料的新品種大量產生，沖破了

《七略》的分類體系，產生了四部分類法。在四部分類法產生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目錄的編纂形式簡化了，有的祇有簡單著錄，沒有敘錄；有的連分類的大小序（即輯略）都沒有，即有也非常膚淺，使目錄失去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章學誠在撰《和州志藝文書序例》的時候，認為這裏面的原因，是由於“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指按《七略》分類表編書），自符體系”；四部以書籍亂了部次（品種多了，《七略》分類表不適用了），因而失去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義。目錄與圖書資料在歷史發展上的這一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其原因絕不在這個地方。改進的方法，也絕不能如章學誠在《和州志藝文書》裏所做的那樣，把重要史籍仍附春秋，把重要文集附於諸子，才算“考鏡源流”。這樣的做法不但不能考鏡源流，正是反歷史主義的。所以章學誠在修改本的《校讎通義》內改正了這一錯誤。他說：“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四部的優點是適應圖書資料發展的新情況；應該繼續保持並發揚它的優點，而糾正它的缺點。對於糾正的方法，章學誠一則說應該“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⑩，再則說，“《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⑪章學誠還在《宗劉》篇內給幾個新興的圖書品種，如歷史書籍、文集、書鈔、詩文評等擬作了類序，示以“討論流別”之義，以提高目錄的學術思想性。

系統目錄是我國目錄工作中開創最早、成就最大的，如上所述，章學誠依據社會發展和圖書目錄發展的觀點，更系統地闡述了系統目錄的發展規律。為了貫徹目錄學與學術思想史相結合，發揮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章學誠又指出《輯略》“最為明道之要”，要求目錄工作者着重的編寫分類的大小序，討論流別，加強目錄的系統性和思想性。這些都是章學誠的目錄學系統

思想中極重要的地方。

3. 圖書分類著錄的輔助法——互著與別裁 我國古代目錄的發展與成就，其水平遠遠超過了同時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國家，其原因與我國首先建成系統分類目錄有着很重要的關係。當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的科學文明逐漸上升的時候，分類目錄開始發展，而我國目錄仍然繼續迅速的提高，還是遠在歐洲之上，這與我們在系統分類目錄的優良傳統上，又發見了互著別裁在分類著錄上的輔助作用，有着很重要的關係。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內，既闡述了他的系統目錄思想中圖書分類著錄的重要意義，又極其精闢地發揮了互著別裁在分類著錄中的重要輔助作用，使我國的系統目錄，尤其是專科目錄與參考目錄，在與學術思想史相結合的方法上，更大大的提高了一步。

我國古代目錄學家，如劉向、劉歆、荀勗、王儉、阮孝緒、毋煥、鄭樵，都是非常重視圖書分類法的改進的。但由於他們所編製的多是藏書目錄，在著錄的習慣上不容易促進互著別裁法的運用。據我現在所知，我國第一次有意識的使用互著法是十四世紀初期馬端臨撰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王應麟的《玉海·藝文》已經使用了互著，但他是類書的類目或編題的互著，而不是圖書的互著）。第一次互著與別裁兼用的是一六二〇年祁承燦編成的《澹生堂書目》。祁承燦在《庚申整書例略》中討論了在分類著錄中“通”和“互”的方法，即互著別裁的方法。他雖在編製《澹生堂書目》時運用了這兩種方法，但對於別裁的意義和互著與別裁交互為用的方法，還沒有很深刻的認識。到章學誠撰《校讎通義》，才把這兩種方法發揮到了非常精闢、非常成熟的地步。

在分類著錄的過程中，一書著錄在一類好像是不可動搖的規律；但為了使各類書的內容互相發生聯繫，非到圖書的分類著錄發展到一定的時期是不容易被發見的。所以互著別裁法的發見

標志着分類法的進一步提高。章學誠對於互著別裁的闡述，並企圖使這一先進方法在分類著錄中普遍使用起來，是他在我國目錄學上的另一貢獻。

章學誠在闡明互著法的時候，再一次申明了系統目錄的重要意義，他說：“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可是，必須在有了互著法之後，才更能發揮系統目錄“繩貫珠聯，即類求書”的功用。他又說：“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②這就把“互著”的意義和方法說的非常明白了。章學誠還恐使用的人不能靈活運用，又進一步說明了互著法把一書不避重複的著錄在兩個類目之內，主要是在“書之易淆者”與“書之相資者”的情況之下。“書之易淆者”是指一書雖祇有一個主題，但那個主題有的和兩個類目都有關聯；“書之相資者”是指一書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題，那就必然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目相適應。在這樣的情況下，則一書都有兩用，不能避重複而不載。在這些地方，就都應該靈活的運用互著法。他說：“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③又說：“部次羣書，標目之下，……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④

互著別裁都是在分類著錄中，遇到“理有互通，書有兩用”的時候，在兩個類目中“兼收並載”。它們不同的地方，互著的兼收並載是把一書同樣的著錄在兩個類目中；別裁的兼收並載則是把一

書(原書)著錄在主類中,而把書中與他類可以“互通”或“兩用”的部份,裁篇別出,著錄在相關的類目中。這樣看來,互著別裁的作用是相同的,方法也是相似的。那末,在甚麼情況之下才使用別裁法呢?章學誠說:“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②

使用別裁法的時候,必須知道裁篇別出的部分要具有什麼特徵。章學誠說:“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說也,其所采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③。可是具有這兩種特徵的地方,古人常有別出行世之本;編製圖書目錄的人,凡是根據那種單本著錄的,不論它的母本(即原書)著錄與否,不得謂之別裁。凡是正式使用別裁法的,章學誠認爲必須在本篇之下,標明子注,以“申明篇第之所自”,讀者見了,就知道那是爲了“學問流別”而有意識的爲之裁製的。章學誠恐怕人們不明白,又舉例說:“《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製也。”^④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知道章學誠對於互著別裁法的意義和功用是有極其深刻的認識,極其精闢的理論,並且把它的定義和使用法規定得這樣謹嚴。他本人又把這一新的方法靈活地運用到系統目錄——尤其是專科目錄與參考目錄之內,就把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把目錄的參考價值,提高到一個新

的水平。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卷二和卷三，曾經運用這兩種方法批判了、並補充了《漢書·藝文志》的不足，又在《史籍考》內，對於經、子、集三部份書，凡有與歷史書籍相關聯的地方，也都使用這兩種方法，尤其是別裁法，著錄了一切與歷史有關的書籍，使《史籍考》成為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歷史專科參考目錄。

章學誠對於互著別裁，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有這樣高深的理論，而且在實踐中運用的這樣謹嚴正確，這在目錄學上的貢獻是很大的。但他不自以為功，而認為劉歆在《七略》中已經開創了互著別裁法的使用，後來經過班固的省併，以致散逸失傳。這一見解不能說是他的謙摛，而實在是他的錯誤。因為章學誠所指出的《七略》中一些互著的例子，雖可視之為別裁，但那些別裁，又都是章學誠所說的不但不是像《隋書·經籍志》或《文獻通考·經籍考》之“幸而偶中”，而是據“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裁之耳”，的“別裁”，因而都不是有意識的使用別裁法，也就都不是別裁。原因就是在那時候，我國還根本沒有發明互著別裁的方法。

章學誠對於馬端臨已經使用互著法大概是没有注意到；對於祁承燾的《整書例略》也可能是沒有看到；但在章學誠以前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互著別裁已經逐漸流行、使用，他不能不受到一些影響。互著別裁不是章學誠首先發見的，而直接給他影響的好像是劉歆的《七略》，但那是錯覺。我嘗說這個錯覺有如“郢書燕說”，就是說，他對他所根據的《七略》雖說沒有正確的理解，但他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 ※ ※

末了，還是回來再談一談我的《通解》。我以這樣的方式來解釋古典書籍還是第一次，所采用的逐章逐條用通解式的解說方式，着重的闡述目錄學的方法、理論和觀點，這也是一種新的嘗

試。我認爲這種作法可能對讀者幫助是會大些的，但還是不敢自信。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以便將來改正。又《校讎通義》的內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討論《漢書·藝文志》的，所以，一般的書名、人名，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於《漢書·藝文志》，章學誠引用的目的是在說明分類著錄上的問題，祇有在有關學術源流的地方才涉及書的內容。所以我對於一般的書名、人名不加注解；注重於有關學術源流的考釋。另外，對章學誠在說明書名、人名的分類著錄等一般問題上，讀者最好備本《漢書·藝文志》，隨手翻閱，以備查考。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王重民記

-
- ① 《文史通義》（1956年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外篇三，《家書》六。
 - ② 同上，內篇一，《易教》上。
 - ③ 同上，內篇二，《原道》中。
 - ④ 同上，《原學》上。
 - ⑤ 同上，內篇四，《答客問》下。
 - ⑥ 同上，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 ⑦ 同上，內篇四，《答客問》中。
 - ⑧⑨ 同上，《答客問》下。
 - ⑩ 同上，外篇三，《與陳鑑亭論學》。
 - ⑪ 同上，內篇二，《原道》下。
 - ⑫ 同上，外篇三，《與吳胥石簡》。
 - ⑬ 同上，外篇三，《與朱澹涸中翰論學書》。
 - ⑭ 《校讎通義》（1956年古籍出版社標點本）卷一，《原道》一之一。
 - ⑮ 同上，一之二。
 - ⑯ 《校讎通義·自叙》。
 - ⑰ 《校讎通義》《原道》一之三。
 - ⑱ 同上，《宗劉》二之一。

- ①⑨ 同上,《宗劉》二之八。
- ②⑩ 同上,《互著》三之一。
- ③⑪ 同上,三之四。
- ④⑫ 同上,三之五。
- ⑤⑬ 同上,《別裁》四之一。
- ⑥⑭ 同上,四之二。